

## 道統的建構——重論朱熹四書編次

陳逢源\*

### 【摘要】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乃是一生思索建構的成果，不僅影響深遠，尤其關乎學術流變，更是必辨析精微，方能深中肯綮，然而歷來有關四書次第，卻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不僅後世祖述各有取用，觀點分歧；就以朱熹而言，同樣也有諸多說法，未可一概而論。尤其後人常以朱熹論及四書次第，須由《大學》而《論語》、《孟子》，再至《中庸》的進學方式，斷定《四書章句集注》應以此為序，於是其中失去統緒，結構頗有扞格。筆者重新檢視朱熹撰作歷程，深覺其中有待釐清，於是分析〈大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文意脈絡，按覈《朱子文集》，以及相關語錄，似乎必須回歸於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序，重新排定《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次第，方能彰顯朱熹建構「道統」的深意。

關鍵字詞：朱熹 四書 理學 經學

---

\*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朱熹建構四書固然是前有所承，但形就體系，出自朱熹，有關研讀四書的次第，自然必須溯至朱熹的意見，只是歷來卻有諸多不同的安排情形，最常見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方式，包括真德秀《四書集編》、趙順孫《四書纂疏》、胡炳文《四書通》、詹道傳《四書纂箋》、蔡清《四書蒙引》、呂柟《四書因問》等，據《四庫全書總目》「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為一冊，遂移《中庸》於《論語》前」<sup>1</sup>的說法，其中純就刊刻編輯方便，實在無關宏旨。至於按照朱熹建構道統的架構，明代科舉命題移《中庸》於《孟子》之前，體現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聖賢相傳的精神，則是另一種方式<sup>2</sup>。至於清末光緒「欽定學堂章程」規定之研習順序，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序，則是考慮以切近淺易的內容為先，有關學理精義者為後，強調從日常生活，為人處世中著手，漸次而進，終至了解儒學精義<sup>3</sup>。延續至民國，中學課程架構中有「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同樣也是依《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順序安排，臺灣學子對於四書

<sup>1</sup> 紀昀奉敕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1971年7月）卷三十五〈四書類〉「《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中庸章句》一卷」提要，頁721。按：以《四庫全書》所收四書論著為例，多數皆是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序，不過所收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卻是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次第，相同者有陳天祥《四書辨疑》、張存中《四書通證》、王充耘《四書經疑貫通》、史伯璿《四書管窺》、胡廣等奉敕撰《四書大全》等，兩種次序最為多見。至於其他少數例外，如袁俊翁《四書疑節》、毛奇齡《四書臆言》、程大中《四書逸箋》以《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為序、楊名時《四書劄記》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序，已屬少數。

<sup>2</sup> 同注1，頁721。

<sup>3</sup> 見張百熙撰《欽定學堂章程》（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欽定蒙學堂章程」規定第一年讀《論語》，第二年讀《論語》、《孟子》，第三年讀《孟子》，第四年讀《大學》、《中庸》。頁8~11。

並不陌生<sup>4</sup>，只是對於其中順序，顯然並未多所留意，尤其在課程精減的原則下，逐漸以《論語》、《孟子》作為核心，對於四書次第緣由，自然也就不甚了了<sup>5</sup>。

事實上，朱熹本身思考四書架構，其實也包括其中學習進程，既強調為學有要，順序當然是十分重要的問題，《朱子語類》所錄足以了解此一思索的內容，撮舉其要：

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

《中庸》工夫密，規模大。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

《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

《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sup>6</sup>

可見其中次第安排攸關進程的工夫，從《朱子語類》朱熹屢屢以「大坯模」、

<sup>4</sup> 民國四十三學年度起，師範學校教授四書，四十五學年度起高中也教授「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選錄《論語》四分之三、《孟子》五分之三、《大學》全部、《中庸》五分之二，佔四書三分之二分量，不過至民國五十一年修正「中學課程標準」，則以選授《論》、《孟》為範圍，詳見馮大綸撰〈高中國文選授論語孟子之我見〉，《孔孟月刊》（1963年1月）1卷5期，頁11~12。

<sup>5</sup> 從研究四書進一步集中於孔、孟的探討，一方面《論》、《孟》內容明確，分量較豐；另一方面也是「經學」逐漸「子學」化的結果，孔、孟思想成為文化核心，詳見拙撰〈四書研究〉，林慶彰編《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5月）頁226~227。

<sup>6</sup>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 1986年12月）卷十四「綱領」，頁249~250。

「問架」、「規模」、「行程」、「腔子」等來形容《大學》，而《論語》、《孟子》則是《大學》中「肉菜」，揣摩其中，研讀《大學》可以提綱挈領，幫助學者建立規模，而《論語》、《孟子》所載多屬具體之行事，學者可以藉此有更堅實明確的體認，如能融會貫通，推至精微，自然有助於了解《中庸》開示的內涵，其中是彼此銜接，不僅具體呈顯儒學規模，也提供學者依序而進的方向。相較於漢代「遞稟師承」的經學傳統，學者僅能「訓詁相傳」，各守專經，學術彼此歧出<sup>7</sup>，朱熹由博返約，以《大學》縮合四書，以四書引領五經，學者終於有簡易操持的工夫與明確的進學路徑，儒學也終於有完整的體系，朱熹思索的進程，對於儒學發展而言，非常具有意義。進一步檢視《朱子語類》更可印證朱熹確實是以依此教誨門人，徐萬錄云：

庚戌五月，初見先生於臨漳。……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卻易為力。」<sup>8</sup>

門人黃○錄云：

先生問 與伯豐、正淳：「此去做甚工夫？……每日看一經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自依次序循環看。……」

9

門人郭友仁錄云：

鄭子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曰：「數年不見公，將謂有異問相發明，卻問這般不緊要者，何益？人若能於《大學》、

<sup>7</sup> 參見拙撰〈乾嘉漢宋學之分與經學史觀關係試析——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為中心〉，蔣秋華主編《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0年10月）頁163～168。

<sup>8</sup> 同注6。卷一百一十五「訓門人」，頁2778。

<sup>9</sup> 同注6。卷一百一十五「訓門人」，頁2812～2813。

《語》、《孟》、《中庸》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折莫甚大事，以其理推之，無有不曉者，況此末事！今若此，可謂是『颺了甜桃樹，沿山摘醋梨』也！」<sup>10</sup>

朱熹師生既是以四書相砥礪，也就無怪乎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序。事實上，弟子黃榦撰〈朱子行狀〉也是以此總括朱熹一生教學旨趣，云：

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sup>11</sup>

既有理據，又有朱熹晚年講論行事可供參證，所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序，乃是朱熹一生思索的結果，應無可疑。對此前輩學者，申之已詳，如程元敏先生就認為「研究四書，必由朱註，既由朱註，則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這規模就是明明德；『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論語》的根本為仁；『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孟子發越了仁裡面的義；最後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一理應萬事，就是這微妙處」<sup>12</sup>，陳鐵凡先生認為教學可以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序，但四書次第仍應以朱熹原訂為準<sup>13</sup>，其他相同之見既多，難以一一贅舉，學者對於朱熹四書次第，似乎已具定見。

筆者曾參與「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設置及運作計劃第三期」林慶彰

<sup>10</sup>同注6。卷一百一十五「訓門人」，頁2843。

<sup>11</sup>黃榦撰〈朱子行狀〉，《勉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第1168冊）卷三十六，頁426。

<sup>12</sup>程元敏撰〈談四書原來的編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孔孟月刊》（1966年11月）五卷三期，頁13。

<sup>13</sup>陳鐵凡撰〈四書章句集注考源〉，錢穆等撰《論孟研究論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10月），頁39。

教授負責的「臺灣地區近五十年經學研究成果報告」中有關《四書》部分的撰寫，在二年半的資料蒐輯當中，嘗試了解臺灣五十年來研究《四書》的成果，有關四書次第，雖然只是一個小環節，但前輩學者推究淵源，已無疑義，所以也就少有思考，不過晚近反覆檢閱《朱子文集》，按覈《四書章句集注》，卻覺其中似乎仍有值得推敲之處：一、朱熹既已稱之「四書」，四書應為一體，但朱熹卻撰寫兩篇序文；二、《中庸》列之最後，但朱熹卻以〈中庸章句序〉，另起開端，安排殊為奇怪；三、《論語》、《孟子》既關乎孔子、孟子，地位無庸置疑，但朱熹卻並未撰序引介，有違常例；四、《孟子集注》最後列舉程頤序「明道先生」一段文字，表彰程顥為「孟子之後，一人而已」<sup>14</sup>，明顯與經旨闡釋無關，卻綴之文末，大加表彰。凡此種種，關乎體例，但卻令人不解，以目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編輯順序，問題既無法釐清，按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進學次第，也有扞格之處，心有不安，是以嘗試釐清其中線索，希望可以有更清楚的了解。

## 二、朱熹列舉情形的檢討

朱熹於四書特別表彰「河南程氏兩夫子」，凡有見解，往往溯至二程，然而檢校《二程全書》，言論雖兼及《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容，但其中並未有體系性的思考，僅有一處唐棣所錄伊川之語，云：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

---

<sup>14</sup>朱熹撰《孟子集注》，《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卷十四，頁377。覈以朱熹編程顥、程頤撰《二程全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6月）原文，頁252。朱熹僅刪削調整部分文字，呼應孟子「無有乎爾」的感慨，然而重點所在，似乎更在於藉此建立二程直接孟子道統之傳的線索。

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sup>15</sup>

以《大學》為入道之門，似乎已啟朱熹思考為學進程的方向，不過此外並未有太多的闡發，自然也就無法彰顯進程的意義。至於影響朱熹至鉅的李侗，強調於喜怒哀樂之未發，體認天理，於是涵養工夫，歸於純粹，學術重點則在於《春秋》、《中庸》、《論語》、《孟子》，此於朱熹所作〈行狀〉已可具見<sup>16</sup>，與朱熹以《大學》為先的主張，明顯不同。事實上，覈以朱熹成學過程，從父親朱松的安排，以及劉子翬、劉勉之、胡憲三先生的啟蒙，都以北宋伊洛二程為宗，所以對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等，皆是時時體驗，處處參詳，甚至援據禪理，以求悟道，對於內容自然並不陌生<sup>17</sup>，只是早年未及於體系的思考，所以列舉也就頗為隨意，以紹興三十二年（西元一一六二年）孝宗即位，朱熹應詔上封事，言及「道統」之傳，展現思索學術的成果，也僅提及由《大學》而入於六經的路徑，云：

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

---

<sup>15</sup>朱熹編 程顥、程頤撰 《二程全書》卷二十四「伊川語錄」，頁206。朱熹〈經筵講義〉並且引以說明《大學》的重要，見朱熹撰《朱子文集》（陳俊民校編，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2月）第二冊，卷十五〈經筵講義〉，頁475。足見朱熹對此之重視。

<sup>16</sup>朱熹撰《延平答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六九八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附錄」云：「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雒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頁671。

<sup>17</sup>朱熹〈祭開善謙禪師文〉見明釋心泰撰《佛法金湯篇》卷十五云：「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道絕徑塞，卒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開悟之說，不出於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師出仙洲，我寓潭上。一嶺間之，但有瞻仰。丙寅之秋，師來拱辰。乃獲從容，笑語日親。」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五輯第十三冊 頁693。

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

18

隔年召見，奏事於垂拱殿，同樣推闡《大學》格物窮理以至於治國、平天下的旨趣，而未及其他<sup>19</sup>。可見朱熹此時著力於《大學》義理，但似乎尚未思索與《論語》、《孟子》、《中庸》相互的關係，自然對於體系進程並未多所闡發。事實上，以《朱子文集》所載朱熹撰作文字為例，其中列舉情形有：

#### (一)《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卷二十六〈舉陳丞相別紙二〉（五十一歲）<sup>20</sup>、卷五十二〈答吳伯豐二〉（六十歲）、卷五十三〈答胡季隨十二〉（？）、卷五十四〈答郭希呂五〉（五十九歲）、卷六十〈答潘子善九〉（六十九歲）、卷六十二〈答王晉輔四〉（六十九歲）、〈答黎季忱〉（六十四歲）

#### (二)《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卷四十三〈答陳明仲七〉（三十五歲）、卷四十九〈答陳膚仲一〉（五十五歲）、卷五十三〈答胡季隨二〉（五十五歲）

#### (三)《論語》、《孟子》、《中庸》、《大學》

卷四十六〈答潘叔昌四〉（五十五歲）、卷四十七〈答呂子約一〉（四

<sup>18</sup>同注15。第二冊，卷十一〈壬午應詔封事〉，頁347。

<sup>19</sup>同注15。第二冊，卷十三〈癸未垂拱奏劄一〉，頁409。

<sup>20</sup>其中年歲，依陳來撰《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所考。



十四歲)、〈答呂子約二十三〉(五十五歲)、〈答呂子約二十四〉(五十五歲)、續卷五〈答羅參議〉(三十六歲)

(四)《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卷五十〈答潘恭叔四〉(五十七歲)

(五)《大學》、《論語》、《中庸》、《孟子》

卷五十四〈答郭希呂四〉(五十九歲)、卷五十八〈答胡平一〉(五十二歲)、卷五十九〈答曹元可〉(六十二歲)、卷六十九〈學校貢舉私議〉、卷七十四〈滄洲精舍諭學者〉、卷八十〈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卷八十二〈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六)《論語》、《中庸》、《大學》、《孟子》

卷七十八〈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七)《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卷九十二〈潘氏婦墓誌銘〉

其中列舉形情相當複雜，既非不同時期列舉有所差異，順序也不一定以《大學》為先，《中庸》為末，至於《論語》、《孟子》與《大學》、《中庸》更常是交互排列。以對象而言，有同一個人，卻有不同的列舉情形，如胡大時(字季隨)；甚至前後書信之間，順序安排已有不同，如郭津(字希呂)，其中似乎缺乏一定的原則。此一情形同樣反映在《朱子語類》，其中雖然多數列舉《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序，但其中也不乏不同的排序<sup>21</sup>，似乎說明朱熹講論之際，確實常有不同的排序。只

<sup>21</sup> 檢校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其中多數是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序，但亦不乏其他方式，如卷十一李杞所錄「《語》、《孟》、《中

是一方面言談之間，未必嚴謹，門人筆錄，難免有誤，所以《朱子語類》所錄也就不再一一深究，然而從文獻材料所見，不免讓人懷疑朱熹列舉乃是出於隨意，但以朱熹〈答呂子約一〉云：

今觀來論，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以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sup>22</sup>

明確要求循序而進，似乎又代表朱熹列舉確實是有順序上的考量。只是其中次第歧出，與普遍習知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進程路徑不同，凡此種種，在在使人疑惑，或許朱熹留意其中次第，思索既久，但究竟何者為先？如何安排架構？一直未有定論，也或許有諸多思考的面相，臨文寫作，即席講論，各有不同，所以才有如此紛雜的情形，文獻檢討，似乎未能給定答案。不過，如果勉強推究，以列舉的次數分析，《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以及《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兩種安排最為頻繁，次數也不相上下，前者固然是我們所熟知的進程，但後者出現於朱熹對於課程的研議，訓勉後學，甚至是表彰前賢的文章，比較而言，屬於更為正式的書面記錄，朱熹全然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序，比例既高，似乎已非出於偶然。可見以往習知的四書次第，並非可以執一而論，而《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序，似乎也深具安排用意。

---

庸》、《大學》」，頁195。卷十四襲蓋卿所錄「《大學》、《中庸》、《語》、《孟》」，頁249。卷一百二十一沈僩所錄「《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頁2918。

<sup>22</sup>同注15。第五冊，卷四十七〈答呂子約一〉，頁2117。

### 三、朱熹撰作的考察

朱熹對於四書次第的安排，如此分歧，似乎必須回歸於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歷程考察，朱熹繼承北宋二程伊洛之學，其中反覆咀嚼思考，實乃一生事業，朱熹〈答胡季隨二〉云：

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sup>23</sup>

其中惕厲反省，仔細思索，具體可見，甚至臨終之前，仍為《大學》改作思索不已<sup>24</sup>，以今所見，從朱熹任同安主簿兼主縣學，親為縣學諸生講授《論語》開始，似乎已有纂輯講論內容的情況<sup>25</sup>。此後反覆纂修，最終完成《四書章句集注》，業師董金裕先生〈朱熹與四書集注〉特別分別朱熹撰作三個階段：一、南宋孝宗隆興元年（西元一一六三年）朱熹年三十四完成《論語要義》，之後又刪錄成《論語訓蒙口義》，作為家塾童子學習入門之用。二、從孝宗乾道八年（西元一一七二年）朱熹年四十三，延續到孝宗淳熙七年（西元一一八〇年）年五十一，撰成《論孟精義》，範圍

<sup>23</sup>同注15。第五冊，卷五十三「書」〈答胡季隨二〉頁2509。

<sup>24</sup>不著撰人《兩朝綱目備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三二九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六「三月甲子朱熹卒」下云：「先是庚申熹臟腑微利，……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此熹絕筆也。是日午刻暴下，自此不復出書院……。」頁778。

<sup>25</sup>同注15。第四冊，卷三十九〈答戴邁〉云：「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為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頁1613~1614。

兼及《孟子》，之後又補充遺漏，更名為《論孟要義》<sup>26</sup>。三、從孝宗淳熙四年（西元一一七七年），朱熹年四十八，撰成《論孟集注》，以及《論孟或問》兩書，延續到寧宗慶元六年（西元一二〇〇年）年七十一，臨終之前。《四書章句集注》代表朱熹一生思索的成果，業師董金裕先生論述層次井然，可以參據<sup>27</sup>。然其中較具爭議是《大學章句》、《中庸章句》，朱熹序定於孝宗淳熙十六年（西元一一八九年）年六十，不免讓人以為《大學章句》、《中庸章句》晚出，其實朱熹對於《大學》、《中庸》思索既久，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推斷朱熹完成《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草稿應在乾道八年（西元一一七二年）年底<sup>28</sup>，至淳熙四年（西元一一七七年）已具完稿，四書乃是同時而成，王懋竑纂訂《宋朱子年譜》「四年

<sup>26</sup>同注15。第八冊，卷八十一「跋」〈書語孟要義序後〉云：「熹頃年編次此書，鋟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焯明仲，復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見而悅之，既以刻于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頁4022。毗陵周氏即周孚先，字伯忱，為程頤弟子。可見此書乾道八年初刻於建陽後，淳熙七年又刻版於隆興，改名為《語孟要義》，增補程、張、周氏之說後，又再度更名為《語孟集義》，但今則復其原名作《論孟精義》。詳見紀昀編修《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5月）卷三十五「《四書》類」「《論孟精義》三十四卷」提要 頁723。然而不論是「精義」、「要義」、「集義」，所列全為宋儒，所重在於義理，於此極為明晰。

<sup>27</sup>董金裕撰〈朱熹與四書集注〉《國立政治大學學報——人文學科類》70期上 1995年6月 頁2~4。

<sup>28</sup>束景南撰《朱熹年譜長編》據《張南軒先生文集》中答朱熹書信考云：「按書十三言及魏揆之疾危，魏卒於乾道九年閏正月。……可見朱熹先約在十月寄《中庸章句》首章，然後約在十二月寄去全本《中庸章句》。朱熹之草成《中庸章句》約在十一二月間。」頁480。按：《朱子文集》卷三十一〈答張敬夫十〉標為「壬辰冬」，內容討論「在中之義」，而〈答張敬夫十一〉則已舉出《中庸章句》。頁1186~1188。可以據此佐證朱熹確實在乾道八年壬辰年冬完成《中庸章句》。而依朱熹〈答林擇之十三〉所載，《大學章句》則似乎更在之前完成。

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下云：「先生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之。」<sup>29</sup>《年譜》雖然僅言及《論孟集注》以及《或問》，但其實也包括《大學》、《中庸》<sup>30</sup>，東景南並據以撰成〈朱熹前四書集注考——從四書集解到四書集注〉一文，認為「集解」是「集注」的基礎<sup>31</sup>，以「集解」來概括朱熹撰作有一段漫長準備過程，至於後人對於朱熹的撰作

<sup>29</sup>王懋竑纂訂《宋朱子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8月）頁65。

<sup>30</sup>諸本年譜均只言及是年完成《論語孟子集注》、《或問成》，至於《大學》、《中庸》部分則成為淳熙十六年己酉，但東景南依〈答皇甫文仲四〉以及李性傳〈饒州刊本朱子語續錄後序〉云：「《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成書雖久，至己酉乃始序而傳之。」認為其實朱熹《大學章句》、《中庸章句》有兩次序定，淳熙十六年己酉所作〈大學章句序〉與〈中庸章句序〉乃由淳熙四年序定《大學章句》、《中庸章句》所作序修改而成。詳見氏撰《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卷上淳熙四年丁酉六月二十四日「《論語集注》、《或問》、《孟子集注》、《或問》、《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輯略》成，序定之」一條所考。頁585~588。又〈朱熹前四書集注考〉考之更詳云：「《章句》乃以己意去取諸家，《或問》乃設問答以述去取之意，故序定《章句》必當同時作《或問》以相發明。……前考《論語集注、或問》與《孟子集注、或問》亦稿成于淳熙四年（丁酉本），《大學章句、或問》與《中庸章句、或問》亦序定于淳熙四年，決非巧合，是年朱又序定《詩集傳》，《易傳》稿具（舊作《周易本義》成），可見淳熙四年本為朱熹生平經學思想發展轉捩之年，而以《四書集注》之成為標志也。又朱熹《文集》卷八十一有〈記大學後〉，乃定《大學》之本；又有〈書中庸後〉，乃定《中庸》之本。卷八十一皆為題跋，按年編次，此二跋正作在淳熙四年，此亦為朱熹淳熙四年序定《大學章句、或問》與《中庸章句、或問》之一證，朱熹必是據己所定《大學》、《中庸》之本以序定《章句》、《或問》，則淳熙四年亦可謂朱熹生平《四書》學正式確立之年矣。」收入氏著《朱熹佚文輯考》（鹽城：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頁612。

<sup>31</sup>東景南撰〈朱熹前四書集注考——從四書集注到四書集注〉，《朱熹佚文輯考》頁592~618。

會有疑而未定，難究其實的困擾，實乃肇因朱熹注解四書，其間反復增刪修改，既是時時改易，自然難以清楚釐清時間，《四書章句集注》是朱熹一生思索聖人之道的成果，反映的是與時俱進的內容，思考面相不同，列舉四書順序多有分歧，似乎也就不足為奇。

不過以其漫長撰作過程，朱熹卻於孝宗淳熙十六年(西元一一八九年)六十之齡，正式序定《大學章句》、《中庸章句》，似乎代表思索四書義理有了具體成果，翌年更於臨漳刊刻「四經」、「四子」，四經包括《書》、《詩》、《易》、《春秋》<sup>32</sup>，至於「四子」也者，〈書臨漳所刊四子後〉云：

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為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sup>33</sup>

所謂「四子」是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既是以經文為主，附以音讀，顯然並非刊刻《四書章句集注》，但朱熹於正式序定《大學章句》、《中庸章句》之後進而刊刻「四子」，似乎也證明「四子」的架構乃是多年撰作《四書章句集注》所獲致的心得。朱熹強調恢復原本，一方面落實二程先四書而後六經的成學順序，另一方面則使學子直接上究聖人經典，自此一改漢儒以師法家法傳經的概念，開啟宋學遙接聖人的學術主軸，新的經學「典範」於茲建立，其意義之重大，也就無怪乎朱熹慎重其事撰〈刊四經成告先聖文〉以昭告先聖先賢<sup>34</sup>。至於使用「四

<sup>32</sup> 同注15。第八冊，卷八十二「跋」〈書臨漳所刊四經後〉頁4069~4073。

<sup>33</sup> 同注15。第八冊，卷八十二「跋」〈書臨漳所刊四子後〉頁4079。

<sup>34</sup> 同注15。第八冊，卷八十六「祝文」〈刊四經成告先聖文〉頁4261。

子」的名稱，落實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聖賢相傳的意象，無疑是補入其中失落的環節，於是四書代表聖人家法，而《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序，也就代表道統之傳的線索，意義更關乎朱熹學術的建構，此為朱熹晚期著力之處。事實上，以朱熹〈答楊子直二〉一文可以一窺始末，云：

來書譙責不少置，不記前書云何，何所得罪，一味惶恐而已。……且如今書「四子」之說，極荷見教。然此書之目，只是一時偶見，《大學》太薄，裝不成冊，難作標題。故如此寫，亦欲見得《四書》次第，免被後人移易顛倒。只如《大學》，據程先生說，乃是孔氏遺書，而謂其他莫如《論》、《孟》，則其尊之，固在《論語》之右，非熹之私說矣。今必欲抑之而尊《論語》，復何說乎？竊恐此意，未必為《大學》壓《論語》發，恐又只是景迂作祟，意欲擯斥孟子耳。萬一揣料失當，所言非是，亦告且為平心息怒，子細見教，使得反復，以究實是之歸，幸甚！幸甚！<sup>35</sup>

楊方（字子直）隨趙汝愚入蜀之時，大抵是淳熙十三年（西元一一八六年）<sup>36</sup>，今雖無法按覈來信內容，但從朱熹文中，可見楊方對於朱熹置《大學》於《論語》之前，頗有意見，朱熹雖然宣稱只是因為調整卷帙的「一時偶見」，但無可諱言，朱熹以「四子」稱「四書」，不僅四書的架構已經確立，似乎也代表四書的次第已然成形。至於其中比較具爭議性的問題是《大學》與《論語》的關係，朱熹以二程之見為依據，置《大學》於前，但如果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架構而言，《大學》屬於曾子，而《論語》屬於孔子，其間順序不免顛倒，朱熹與楊方的爭執，關鍵即在於此，不過如果進一步分析朱熹之意，可知朱熹觀點不同於今，《大學》乃是孔氏遺

<sup>35</sup>同注15。第五冊，卷四十五「書」〈答楊子直二〉頁2011~2012。

<sup>36</sup>詳見束景南撰《朱熹年譜長編》卷下「淳熙十三年五月，修訂《四書集注》，由廣西安撫使詹儀之印刻於桂林，四川制置使趙汝愚印刻於成都」一條所考，頁846~848。

書，而《論語》卻是後學綴輯孔子言論而成，所以由《大學》而入《論語》，反而符合孔子、曾子的傳授脈絡<sup>37</sup>，也無怪乎《大學章句》篇首引程氏之言云：「《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分經別傳之餘，朱熹甚至推究作者「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sup>38</sup>，而《論語集注·序說》引程氏之言云：「《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於二子以子稱。」<sup>39</sup>甚至注解《論語》時更往往推尋弟子門人可能的撰作情形<sup>40</sup>，而〈答韓無咎〉一文朱熹更直揭：「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sup>41</sup>，所以《大學》分量雖少，卻是孔子遺教；《論語》分量雖多，乃是雜出於門人弟子眾人之手，輕重之間，清楚明白。至於由《中庸》而《孟子》代表由子思傳至孟子的脈絡，雖然與習知進程順序顛倒，但其間道統相傳的順序卻無太大爭議。此外，不同於《論語》出於孔門弟子的觀點，朱熹認為《孟子》出自一人所作，〈答吳伯豐十九〉云：「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

<sup>37</sup>朱熹撰《四書或問·大學或問上》（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云：「《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急緩言之，……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頁515。

<sup>38</sup>朱熹撰《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頁3~4。

<sup>39</sup>朱熹撰《論語集注》，《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頁43。

<sup>40</sup>朱熹撰《論語集注》常引胡寅推斷篇章撰作情形，如《論語·里仁篇》云：「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頁74。〈公冶長〉云：「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頁75。〈先進篇〉云：「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頁123。〈憲問篇〉云：「此篇疑原憲所記。」頁148。用意並非在於注解而已，更在於說明《論語》的撰作屬性。

<sup>41</sup>同注15。第四冊，卷三十七「書」〈答韓無咎〉頁1500。



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sup>42</sup>，朱熹對於《論語》、《孟子》的觀點截然不同，雖然有其理據，但細加揣摩，《孟子》出於孟子親作，其實也正落實「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的說法<sup>43</sup>，於此不僅呼應聖賢相傳的「道統」觀點，也開啟宋人遙接聖人之傳的理論依據，所以四書的架構，《大學》、《中庸》卷帙雖少，卻有關鍵地位；《論語》、《孟子》篇幅雖多，卻有其對應承接的位置，於是由《大學》而至《論語》，由《中庸》而至《孟子》，《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序，正具體展現朱熹建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聖人相傳的「道統」體系，既關乎宋儒學術的「淵源」所在，也就無怪乎朱熹於正式論述時多所留意。

#### 四、《四書章句集注》中道統的線索

了解朱熹思索「道統」的用心，也釐清《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順序的關係，有助於重新思考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以往常為人所忽略之處，〈大學章句序〉與〈中庸章句序〉撰成於淳熙十六年（西元一一八九年）二月甲子、三月戊申，相距一個月左右，但按覈其內容，除說明《大學》、《中庸》旨趣之外，朱熹用力所在，幾乎全在於鋪排「道

<sup>42</sup>同注15。第五冊，卷五十二「書」〈答吳伯豐十九〉頁2436~2437。

<sup>43</sup>朱熹撰《孟子集注·序說》，《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引韓愈之言。頁198。道統之傳本就是虛構而出的歷史意象，出於繼承聖人之傳的使命感，卻未必符合歷史實情，朱熹自然也並非不了解，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十九「《語》、《孟》綱領」載「《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433。對於孟子之後是否有傳，答案似乎較為保留，不過本是針對《孟子》撰作的推測，卻引出「軻死不傳」說法的檢討，正可以了解朱熹確實頗為留意「道統」之傳的問題。

統」之傳的線索，〈大學章句序〉云：

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sup>44</sup>

其中有三項重點：一是聖人之道的具體內涵；二、二程接續孟子之傳的線索；三、宋儒學術的主體價值，而三者皆由於《大學》一篇而建構起來。此段文字，可說是朱熹一生的學術事業所在，列於《四書章句集注》之首，提醒學術的宗旨，彰顯「聖經賢傳」的歷史意象，具有綱領的作用，自然是別具意義。只是其中「曾子之傳獨得其宗」，易生順序誤解，所以朱熹於《大學章句》篇首即引程子之言「《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並且直接說明其序順是「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sup>45</sup>，《大學》居四書之首也就清楚明白，朱熹甚至分別經傳，以「經」為孔子之言（詳見前引），雖然其中線索微薄，以清戴震童子之齡，就直指其中不合邏輯<sup>46</sup>，但如果了解「道統」之

<sup>44</sup>同注38。《大學章句》，頁2。

<sup>45</sup>同注38。《大學章句·序》，頁3。

<sup>46</sup>戴震十歲從學，就質疑朱子《大學》經「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的說法，雖然近乎軼事，但正代表清代乾嘉學者求實

傳的脈絡結構，似乎也就不難理解朱熹安排的用意。

至於「《論》、《孟》次之」之意，乃是純就「為學次第」而言，並非《論語》、《孟子》相續，以《論語集注》而言，今本僅見附錄〈序說〉，保留輯錄諸家說法的線索，卻未見朱熹序定，與之前撰〈論語要義目錄序〉、〈論語訓蒙口義序〉、〈語孟集義序〉，態度迥然不同，令人殊不可解，《朱子語類》載云：

語吳仁父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

《論語集注》如稱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sup>47</sup>

朱熹如此看重《論語集注》，而《論語集注》也並非所謂未竟之作，朱熹甚至認為其中「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一生著力於此，有此自信，本屬自然，對於後學未能用功於此的遺憾，溢於言表，也是全然可以理解，只是《論語集注》既是思之有成，朱熹卻未撰序說明心得，提供進一步的指引門徑，不免令人詫異，然而遍檢《朱子文集》，卻僅有一段文字透露一點訊息，云：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

---

的學術精神，已與宋明理學有所不同。參見洪榜〈戴先生行狀〉、王昶〈戴東原先生墓志銘〉所載，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10月）第七冊「附錄」頁4及30。

<sup>47</sup>同注6。卷十九「《語》、《孟》綱領」，頁437。

耳。<sup>48</sup>

揣摩「聖人氣象」本是宋代理學的核心課題，朱熹列《語孟精義》之首，卻於《論語集注》略去，改列程氏讀書之法，去取之間，所謂「嚴科級」，當可了解朱熹對於《論語》的定位，觀點已有不同，《論語》既非上究聖人唯一門徑，聖人氣象應有更為宏觀的視野，《論語》續於《大學》之後，重要的是研讀之法，也就無怪乎《朱子語類》載葉賀孫所錄朱熹安排次第之意，云：

某《論語集注》已改，公讀令《大學》十分熟了，卻取去看。《論語》、《孟子》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做箇匡殼子，卒亦未易看得。<sup>49</sup>

《論語》、《孟子》既成為《大學》中驗證聖人規模的基礎，未加序定，似乎可以推測朱熹認為四書乃是融合一體之作，《論語集注》、《孟子集注》並非獨立而出，而是必須配合《大學》來了解。筆者曾統計《論語集注》中朱熹對於顏淵等三十一位孔子弟子的評論<sup>50</sup>，並非僅是引介注解而已，朱熹不僅分別其中高下，推究與聖人的分別，甚至嘗試從中找尋聖人之教的線索，如《論語·顏淵篇》云：

<sup>48</sup>同注15。第八冊，卷七十四「雜著」〈讀書之要〉頁3726。

<sup>49</sup>同注6。卷十九「《語》、《孟》綱領」，頁428。

<sup>50</sup>統計朱熹《論語集注》中注解孔門弟子，顏淵四十一則、閔子騫五則、冉伯牛二則、冉雍十一則、冉求十三則、子路四十三則、宰我十三則、子貢三十三則、子游五則、子夏十二則、子張二十則、曾子十六則、澹臺滅明三則、宓子賤二則、原憲四則、公冶長二則、南宮适六則、曾點三則、顏路一則、高柴三則、漆雕開四則、司馬耕五則、樊遲六則、有子二則、公西華五則、巫馬施一則、申枨二則、琴牢一則、陳亢二則、孟懿子一則、孺悲一則，共有三十一位，其中雖有重複之處，但可以了解朱熹對於孔門弟子不僅是引介，或是針對經旨闡發而已，而是對於其中學養高下，多所留意，如〈子張篇〉「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頁188。凡此皆可概見朱熹嘗試於孔門中分別高下，進而推尋聖人之道的努力。其中統計有賴政大中研所吳曉昀同學協助，謹以致謝。

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sup>51</sup>

《論語·雍也篇》朱熹引程子云：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在，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sup>52</sup>

其中對「學」之所在，反復申述，而貶抑今人「記誦文辭」也正與〈大學章句序〉中痛陳「俗儒記誦詞章之習」相呼應，朱熹對於孔門傳習既多所留意，看待《論語》的態度，也就十分清楚。後人不明於此，不免多有誤解，例如清汪中〈大學平義〉就認為《論語》未列於前，頗為奇怪<sup>53</sup>；再者，「道統」之傳未列顏淵也令人不解，明豐坊偽《石經大學》甚至於「正修章」添入「顏淵問仁」二十二字，補充朱熹建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統之傳中失落的環節<sup>54</sup>；至於朱熹特別留意於孔門弟子學行高下的分

<sup>51</sup>同注39。卷三，頁132。

<sup>52</sup>同注39。卷三，頁84～85。

<sup>53</sup>汪中撰《述學》（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10月）卷四「大學平義」云：「宋儒既藉《大學》以行其說，慮其孤立無輔，則牽引《中庸》以配之。然曾子受業于孔門，而子思則其孫也，今以次于《論語》之前，無乃慎乎。」頁19～20。清儒對於朱熹建構「道統」既未能深契於心，遂難以了解朱熹安排用意。

<sup>54</sup>豐坊於偽《石經大學》「正修章」補入「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判，清毛奇齡《四書改錯》更直斥「貶抑聖門錯」，大加撻伐，認為有違注解分際<sup>55</sup>，凡此總總，皆是對於朱熹思索「道統」的架構，未能深契於心，然而如果了解朱熹乃是將《論語》視為孔門弟子傳習聖道的材料，既是弟子所錄言行，深究其中，辨析分毫，似乎也是理之當然。筆者曾以毛奇齡《四書改錯》批評為是，對於朱熹注解推尋孔門弟子缺失，有違詮釋分際，頗為不解，然而重新檢視朱熹「道統」的架構，了解四書次第，疑惑似乎也就渙然冰釋矣。

至於《中庸》部分，朱熹於接續次序的說明十分清楚，篇首引程子云：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書，以授孟子。……<sup>56</sup>

《中庸》乃子思所作，於是由子思而至孟子，此書成為縮合的關鍵，子思與孟子世系既不相及，但朱熹卻以「筆之書，以授孟子」，來加強道統之傳的印記，有趣的是原本表彰曾子傳「規模之大」、「節目之詳」的《大學》「明法」，到《中庸章句》卻是呼應《論語集注》中朱熹「傳授心法」的說法（詳見前引），一方面朱熹於「道統」之傳的內涵，更趨於密，「心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乃是以《大學》屬於曾子，於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統之傳，將未見顏淵之學，於是特別造偽添入「顏淵問仁」，使孔門傳道情形更為合理，見李紀祥撰《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8月），頁167。

<sup>55</sup>毛奇齡撰《四書改錯》（張文彬等輯 嘉慶十六年重刊本）卷二十有「貶抑聖門錯」，於《四書章句集注》批評孔門弟子過於嚴苛之處，一一糾正，如批評有子「譬之木，有子說枝葉」、原憲「邦有道而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做得甚事」、「夫子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為，雖無枉道之誠，而未免于素餐之媿」、樊遲「粗鄙近利」、「志則陋矣」、宰我是「良心死了也」、「信道不篤」、子貢是「有志于仁，徒事高遠，不知其方」、冉求是「扶不起」等，頁3~18。朱注詮釋稍過，遂為毛奇齡所批判，詳見拙撰《毛西河四書學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1996年5月），頁130~134。

<sup>56</sup>朱熹撰《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頁17。

法」成為其中的核心；再者，孔門之中，顏淵並未於朱熹道統中失落，似乎也可以由此得其證明，此於〈中庸章句序〉言之更詳，茲錄如下：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sup>57</sup>

其中對於「道統」之傳，推之更遠，也援據更多，所謂「人心惟危」之說，引發後世考據風潮<sup>58</sup>，其中真確與否，並非本文論述重點，茲不贅言，然

<sup>57</sup>同注56。《中庸章句·序》，頁14~15。

<sup>58</sup>張麗珠撰《清代義理學新貌》（臺北：里仁書局，1999年5月）即以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與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之爭，實在肇因於義理的分歧。頁87

而其中有諸多論點，卻是必須從「道統」之傳的角度分析，朱熹補入堯、舜授受內容，「心法」之說更為具體；再者，除曾子之外，其實顏淵也得孔子之傳，然而不論是「心法」之說，或是顏淵之學，皆可上究於朱熹《論語集注》的注解內容，所以從《論語》而至《中庸》，確有朱熹義理上安排的脈絡。事實上，與〈大學章句序〉相較，對於聖人相傳，朱熹不僅有更為清楚的世系，也凸顯孔子雖然無位，但「繼往聖，開來學」，功反而大於堯舜，於是「德」高於「位」，儒學不再依附政治，宋儒道學的地位，也於茲成立，而自唐韓愈以來高倡傳道訴求，形塑儒者自我認同意識，直至朱熹〈中庸章句序〉終於建構完成<sup>59</sup>。

事實上，朱熹不僅強調曾子再傳得子思，子思再傳得孟氏，明白揭示由《中庸》而至《孟子》之序，甚至由補入言心性、斥異端之說，強調子思懼「愈久而愈失其真」的撰作動機，於是《中庸》與《孟子》有旨趣承繼的關係。事實上，闢楊、墨，言四端，孟子確實有更清楚的發揮，所以朱熹《孟子集注·序說》撮舉前賢之說，作為全書綱領，其中不外二項主軸，強調孟子闢異端，得宗傳之正，以及發明心性的貢獻，如引韓愈之言云：

---

~ 88 ~

<sup>59</sup>余英時撰《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冊（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年6月）則考據「道統」一詞，始於李元綱《聖門事業圖》，而終成朱熹弟子黃幹〈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頁43。李元綱原文其實是作「傳道正統」，而黃幹乃是推衍朱熹之說，余氏認為朱熹〈中庸章句序〉中聖王相傳乃是「道統」，而孔子以下乃屬「道學」，概念並不相同，直至黃幹推衍其說，才縮合兩者。余氏推究精微，令人佩服，不過朱熹〈中庸章句序〉既已經明白揭示「道統之傳」，而後文「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則此「統」遙契上文「道統」，文意語脈相續，似乎並沒有必要勉強區分「道統」與「道學」有別，事實上，「道統」是形塑「道學」的核心，朱熹不僅是以「道統」來呼應韓愈以來傳承孟子的訴求，建構其中「德」高於「位」的內涵，更由於二程得其不傳之緒，宋儒道學主體價值的歷史意涵，也得以成立。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也，必自孟子始。」

又曰：「楊子雲：『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除如。』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社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sup>60</sup>

引楊時之言，云：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sup>61</sup>

朱熹引列用意，無疑乃是推尊孟子傳承孔子之學，呼應「道統」之傳的世系，而申明四端，求其放心，於是聖人之學，歸於性善之論，不僅是申明孟子的學術，而且從《論語集注》、《中庸章句》中的「心法」之說，似乎也在《孟子》得其印證。朱熹引列前賢之論，為《孟子》一書定調，用

<sup>60</sup>同注43。《孟子集注·序說》，頁198。

<sup>61</sup>同注43。《孟子集注·序說》，頁199~200。

意也就不難推知，有趣的是朱熹除以〈序說〉指明旨趣，呼應「道統」線索，朱熹於《孟子集注》最後，同樣也是巧為安排，云：

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sup>62</sup>

孟子慨然承擔發揚孔子的主張，在朱熹詮釋之下，孟子既是得「群聖之統」之傳，又期以後世儒者的追隨，所謂「天理民彝」終不可泯滅，後世必能心領神會的「深指」，無疑乃是呼應「道統」之傳的說法，於是原本要求儒者勇於承擔的意識，從聞見之間的體會，遂成具體的「道統」內涵，此一聖聖相傳的歷史意象，原本無可考察，後繼之人，更非注家所能為言，然而朱熹卻又附入一段程頤所撰「明道先生」墓之序文，云：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渙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其情也哉？」<sup>63</sup>

雖未見朱熹評論，但前後之間，已可見其「深指」，孟子憂道失傳，而程顥「明道先生」正是千載之下「神會而心得之」者，如果只是因為「道」之名，就比附牽合，理由實為牽強，興滅繼絕，程顥有功於儒，本屬學術評價的問題，但朱熹完成《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經典的重構，形塑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世系相承的「道統」，卻以「明道

<sup>62</sup>同注43。卷十四，頁377。

<sup>63</sup>同注43。卷十四，頁377。

先生」接續其後，於是「道統」除聖聖相傳之外，必須更及於宋之二程，所以四書是聖人心法所在，也是宋儒學術遙接聖人成就之所在，「道統」之傳成為儒學慨然自承的歷史責任，「道學」更是代表不必依附權勢、功利的天地間偉業。可見四書次第，有其繼承傳續的意涵，而朱熹一生用心，並非僅是經典詮釋而已，更在儒學「典範」的重構工作。

## 五、結論

朱熹彰顯四書價值，影響後世深遠，四書次第，非關宏旨，聖人宏謨懿訓，一字一句，皆有值得深究咀嚼之處。只是研讀四書之餘，自然必須取徑於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反覆檢覈朱熹相關言論，卻深覺其中似乎另有玄機，朱熹並非僅揀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注解經文而已，而是從中思索儒學的內涵，建構宋儒學術主體價值，朱熹深具「體系」思惟方式，卻以經注形態表現，遂於訓詁文義，引述講論之中，言隱於榮華，難以了解朱熹著力所在。事實上，就以朱熹引述的材料，「道統」的概念，遠承於孟子，繼之於韓愈表彰，更重要是北宋諸儒對此之思索，可以說自唐以來，繼承孟子之傳，已經成為儒者共同的想望，也代表儒者繼之而起的一種共同自覺意識，所以覈其思想進程，「道統」並非朱熹獨創而出，然結合北宋以來諸儒有關儒學的體會，揭櫫「道統」之傳，形構具有傳承的歷史意涵，最終匯歸於二程脈絡，朱熹的貢獻卻是無庸置疑，自此儒學有體系、有淵源、有法門，更有超然獨立的歷史價值，只是以往拘於考據的觀點<sup>64</sup>，惑於四書編集的形式，或是朱熹講論之間的進學次第，無法清楚了解朱熹建構「道統」的用心，因此對於四書

---

<sup>64</sup>錢穆撰《四書釋義》（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8月）「例言」云：「故以四書為四子書，為孔曾思孟之道統相傳，實為無稽之說，殆無再拘守信從之意義矣。」頁4。

本身的義理內涵，也就無法有對應的了解，藉由本文的釐清：一方面可以重新檢視朱熹撰作《四書章句集注》更為深刻的用意；另一方面，也了解宋儒接續聖人之統的努力過程，茲以下列數點作為結論：

- (一)有關四書次第，歷來說法多矣，但朱熹既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進學次第，後學遂多以此為依歸。
- (二)然而《朱子文集》之中，卻可以發覺朱熹有關四書次第之說，其實相當分歧，而《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的順序，於正式書錄時，更是朱熹經常列舉的方式。
- (三)朱熹正式序定《大學章句》與《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的體系也於茲成形，其中次第即是《大學》、《論語》、《中庸》、《孟子》。
- (四)朱熹認為《大學》乃孔氏遺書，《論語》為門人弟子之作，《中庸》為子思憂心聖人之道失傳而作，而《孟子》發揚善性，闢異端，確立孔門宗傳，四書遂成為符應聖人相承、心法相傳的重要典經。
- (五)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不僅重構儒學經典，確立儒學的內涵與價值，更從《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的排序中，暗示宋儒繼之而起的歷史地位。

朱熹對於四書的次第，一方面思索其中學習進程，另一方面則是關乎「道統」的設計，其中似乎有諸多思考的面相，未可一概而論，然而以《四書章句集注》而言，則似乎後者更符合朱熹建構用意，以朱熹正式序定《大學章句》、《中庸章句》，代表朱熹於六十歲之齡，終於揭櫫「道統」之傳，完成儒學經典的重構工作，意義非常，自此宋儒學術有其核心思想，也完成宋儒學術的歷史定位，《朱子語類》載沈僩所錄云：

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腳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

方能傳得這個道理。<sup>65</sup>

朱熹的「剛果決烈」，或許即是根源於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聖人傳道的氣魄。筆者從《朱子文集》中一窺朱熹思索方向，進而深究《四書章句集注》體系安排，遂不得不重新思索以往四書次第的觀點，管見所及，不敢自是，謹以就教於方家。

後記：

本文乃是檢閱《四書章句集注》之心得，並非有定執之見。大抵而言，朱熹屢屢以彰顯聖學為念，故進學次序，乃是深思所得。只是在建構學術體系時，卻又可見其另外之思惟，「道統」之說，遂為其中關鍵。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寶貴的意見，不僅是本文修改的依據，也是日後進一步推究思考的方向。

---

<sup>65</sup> 同注6。卷五十二「《孟子》二」，頁1243。

---

**Establishment of the body of transmitted orthodox teachings-Re-sorting the index of “The Four Books selected sentences” edited by Chu His**

**Chen Feng-yuan**

**Abstract**

“The Four Books selected sentences” edited by Chu His, is an achievement after ponder and establish carefully during all his life, it impacts far-reaching and influenc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fashion in scholarship particularly. Unless analysis the detail, one can not understand the main points of his theorem. However, all through the ages, it always diverse and confused about the consecution of “The Four Books”, unable to decide which is right, not only apply by the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or divergence of standpoints in later ages, but even cause the repugnance of statement and lack consistency about the index of “the selected sentences”. Later generations often consider the index about “the selected sentences” should be base on the treat of via the learning sequence of the “The Four Books”. It i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n “Confucian Analects”; “The Works of Menciu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But determine the index of “the selected sentences” by means of this order will lose the agreement and inconsistency in structure of “the selected sentences”.

In this paper, we re-exam the course of compose by Chu His, and find there are some contradictions should be distinguish, after we analysis the skeleton of “The preamble of The Great Learning selected sentences” and “The preamble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selected sentences”, refer to “the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Chu His” and some correlation quotations, we suggest it should recur and anew the sorting by the sequences of Confucius, Zengzi, Zisi and Mencius. It also needs to re- arrange the index to the order of “The Great

---

Learning”, “Confucian Analect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e Works of Mencius” for “The Four Books”, to show the deeply meaning of morality and justice established by Chu His.

**Keywords:** Chu His, The Four Books, the moral theories of the Suhng Neo-Confucian scholars; classical learning